

现代文学专号

29

I206/

1206/

文学评论

丛刊

WENXUEPINGLUN
CONGKAN

现代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二十九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二十九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社科出版社保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 印张 312 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册

统一书号: 10190·208 定价: 2.50元

目 录

《野草》与《爱之路》

——对鲁迅与屠格涅夫的几点看法……………吴小美（ 1 ）

美的发现和追求

——鲁迅散文的美学特点探索之一……………卢 今（ 34 ）

鲁迅、沈从文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潘 南（ 59 ）

彻底解放的追求者和探索者

——丁玲的创作道路……………陈惠芬（ 87 ）

试论“过渡的一代”……………康 林（ 128 ）

试论“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王培元（ 159 ）

论中国左翼创作理论所受的国际影响

……………胡有清（ 167 ）

新文学史上关于题材的第一次争论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的题材问题……………武振平（ 183 ）

“二十世纪的伟大的工作”

——论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贡献……………陈鸣树（ 203 ）

論馮雪峰文学批評的基本特色 徐光明 (225)

克魯泡特金主义的复杂性和巴金前期

思想的矛盾性

——兼与李存光等同志商榷..... 花 建 (244)

彭家煌論 刘 纳 (258)

現代派与戴望舒 殷国明 (271)

論抗战时期国統区詩歌 郭小聰 (292)

論俞平伯的新詩 乐 齐 (320)

杭約赫的政治抒情詩

——四十年代詩论之一..... 唐 湜 (343)

一部頗为特殊的长篇小說

——谈林语堂的《京华烟云》..... 万平近 (360)

《野草》与《爱之路》

——对鲁迅与屠格涅夫的几点看法

吴小美

在我们面前陈放着两个国家、两位大师的这两部艺术珍品，不论就其中所刻印的两位作家痛苦而执着的探索，炽热中略带茫漠的对光明的渴求，人生哲理的深警而奇崛的总结，对黑暗腐朽势力和虚伪的世态人情愤懑的鞭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构思的类似，寓意的仿佛，甚至在形象的选择、象征手法的运用等等方面，都有不少相近之处。研究屠格涅夫和鲁迅两人的散文诗在精神实质和表现手法上的同与异，通过同中别异，加深对文学发展规律和对《爱之路》与《野草》两种文学现象的理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世界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文学创作的雷同，大致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互相在时间上空间上毫无联系，在平行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不谋而合；另一种则是不同作者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本国的历史进程来说，有着相近的发展水平，而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或不同作者在创作时的思想情感的相通，形成了各种耐人寻味的雷同。本文所要研究的课题，似应属于后者。

—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述二十年代的中国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封建压迫的野蛮残酷，经济文化的停滞落后，先觉之士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的艰苦探索等多方面相似的国情民情，而只想着重提出，正是由于为两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性质和状况所制约，在相近似的社会基础上，作家思想情愫的相通，决定了他们完全可能从另一国家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启发，有所借鉴。鲁迅是我国最早觉悟到要向俄国学习的先进人士之一。他最先而最勤于发掘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俄国解放运动的密切关系，并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高度评价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不但“思想殊异于西欧”，而且在艺术上成熟的程度也“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①他写作《野草》，也同他写作《呐喊》、《彷徨》一样，是立足于本民族灾难深重的社会和人生的需要，经过自己严格的筛选，吸取异域营养，博采众家之长，精心构思，自出新裁，结出本民族丰硕的艺术之果。在《野草》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从波特莱尔、尼采、王尔德、泰戈尔、夏目漱石、到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取得的借鉴，但由于鲁迅的借鉴，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社会生活深刻认识和正确反映的基础上的借鉴，是以真切地记录自己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完全融合前内心曲折的经历为核心的借鉴，因此，在“异域”的“众家”中，他借鉴得更多更直接的，还是俄国的屠格涅夫。鲁迅多次呼吁：“中国大嚷过托尔斯太、屠格涅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都没有；”^②“屠格涅夫被评的最多，但至今没有人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220页（以下凡未注明为其他版本者，均为十卷本）。

② 《鲁迅全集》第5卷第207页。

集成一部选集。”^①他一再倡导多看他们的作品，尽管它们“离无产阶级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介绍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②但这也足以唤醒中国的改革者奋起抗争了。

鲁迅和屠格涅夫，在以下这一点上，有着整体的本质的一致：他们毕生没有停止过对真理艰苦的探求，哪怕是在他们最矛盾痛苦的时期，也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借用屠氏的话，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都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儿子。^③在屠氏进行创作的时代，俄国农奴制的总危机日益迫近，资本主义因素急剧增长，贵族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已渐丧失，平民知识分子开始活跃在俄国政治生活中。他的散文诗，集中写于1879—1882年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这是他创作的最后的、最特殊的时期。这特殊性是我为他对俄国命运和个人的遭迁深沉而痛苦的思索所决定的，而这思索又是在反动统治猖獗，革命活动处于低潮，现实生活阴郁丑恶的环境中产生的。七十年代开始，屠氏就在逐渐摆脱自由主义的幻想，冲出“烟”的迷雾，从一个主张自上而下改革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主张自下而上改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仍是渐进论者。在1876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中，他热情赞颂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和献身精神，却又把希望寄托在具有明显乌托邦色彩的索洛明身上。七十年代后期，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现实使他极度失望，索洛明式的人物并没有出现。一方面，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在他思想中占了上风，但同时他却又怀疑这理想是否能实现。加以不治之症对他衰老的躯体的折磨，远离祖国给他增添了强烈的思乡之愁，终生钟情的波利娜又经常不在他身边，这都使他全身心经常浸淫在痛楚

①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75页。

② 《鲁迅译文集》第8卷第3页。

③ 屠格涅夫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儿子。”见鲍尔高斯基著《屠格涅夫传》，乌兰汗译。

不堪的苦水中。他一方面写作一些幻想世界战胜现实世界的小说，使自己避入抽象的伦理和美学领域，并倾向悲观怀疑的叔本华哲学，认为“永恒”和“绝对”的抽象美的理想高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在四年里创作的八十二首散文诗中，几乎复活了他毕生创作的社会基调和主要特色——复活了他对时势的敏感，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本国人民历史命运的艰苦探求，以及他作为第一流语言艺术家的全部艺术力量！

《野草》的写作晚于《爱之路》四十多年。1924——1926年的北京，是反动封建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而当时的中国，除了经济文化更落后外，和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历史进程发展水平相近。那是“五四”落潮后到大革命正式发生前最黑暗的动荡不安的岁月：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五四”时期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都发生了分裂，反动的阴云遮满北国的天空，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南下投向新的革命高潮，“官场学者”、“欧化绅士”乘机抬头，复古的暗影从四面逼来。鲁迅生活和战斗在如“秋夜”一般阴冷漆黑的政治环境中，思想经历着十分复杂矛盾的变化。进化论的宇宙观越来越不能得心应手地解决现实斗争中的具体问题，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和战友的饥渴感和孤独感沉重地折磨着他。社会上“正人君子”的“鬼打墙”，家庭内的兄弟反目，有时比直接的政治压迫更使他难堪。鲁迅是一位始终和时代一起前进的战士，是一位在实践中与中国革命完全一致，但在主观上有时又没有弄清这种一致性的战士。写作《野草》时产生过的彷徨、愤激，苦闷、矛盾、探求和自我批判的情绪，就是他一时不能准确地估计革命形势的新发展和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新的消长所必然产生的主观感受。在那两三年时间里，他无疑更多地以“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坚持他一贯的战斗；但此外，他又有许多难以通过杂文和小说表达的独特的情怀迫切需要表达。这就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屠格涅夫写作散文诗时的客观环境以及作家本人独特的思想感情状况颇为相似——他们都写作于

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在那血与火的新旧交替时期，两位从旧营垒中过来的战士，都产生过由时代的悲剧性质所形成的彷徨和苦闷；但又都没有停息过对光明和理想的探求——这就是他们的散文诗有许多相同或相通点的内因。有了这内因，即使鲁迅并没有接触过或没有阅读过屠氏全部散文诗，也可以解释他们不少散文诗何以那么相似。何况这内因并不排斥鲁迅确曾受过屠格涅夫散文诗影响的可能性，亦即他们的散文诗相似的外因。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对外国散文诗的翻译介绍就是有力的证明。早在1915年，刘半农就率先将屠氏散文诗介绍到了中国来，紧接着，《新青年》、《晨报》副刊、《小说月报》也相继介绍。鲁迅虽未亲自翻译过屠氏的散文诗，但经常发表他的作品的《晨报》副刊和《小说月报》，就是刊登屠氏散文诗和有关介绍文章的主要阵地。屠氏八十二首散文诗有五十一首发表于生前，很快赢得极高的世界声誉；通晓德、日语的鲁迅，不可能不了解它们的流传盛况，并亲自阅读过。而当时作为一位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又必然在博采异域众家之长时，更多地接受坚持创作“为人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屠格涅夫的影响。

二

鲁迅前期的作品，包括小说、杂文和散文诗，从思想实质到艺术方法，可以借用他在《论睁了眼看》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其整体的特点：“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从写《摩罗诗力说》开始，他就力主文艺应该探索人生的本质，寻求人生的规律，阐明人生的真谛。鲁迅“为人生”的文学创作，当然主要是生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但他们的繁花硕果，又是离不开严肃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俄罗斯文学的催肥。如鲁迅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

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①鲁迅和屠格涅夫两位大师，在同样的苦难的现实人生中，又具有同样明确的“为人生”的目的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散文诗在思想上的许多联系，诸如：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优秀作家是不热爱自己祖国的，但的确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象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那样，形成了一股震撼人心、经久不衰的爱国主义激流；而这激流，又是由整整一个世纪的作家对祖国的落后衰败所萌生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汇集而成的。高尔基对此深刻地总结道：“在俄国，每个作家都的确是独树一帜的，可是有一种倔强的志向把他们团结起来，——那就是认识、体会、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②屠格涅夫漂泊终生，许多岁月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但他全部创作不仅没有偏离俄国文学的这个主旋律，反而由于对祖国焦灼的思念而增添了创作中爱国主义的色彩。在他生命最后时期写的许多散文诗中，对祖国，对俄罗斯大自然，对俄罗斯语言，对祖国正直高尚儿女的眷恋之情，给这色彩又加上了厚重的一笔。他在临终前给友人的信中写下：“当您去斯帕斯科耶（按：屠氏的故乡）时，请代我向房屋、向花园、向我的小橡树鞠个躬，我大概再也见不到祖国了。”^③在远离祖国的法国，他痛感自己如“无巢的鸟”，飞过荒漠，飞过海洋，都无处栖身（《无巢》）。在《村》等一系列散文诗中，他以最缠绵的感情，最柔和的色调，最轻快的笔触，描绘俄罗斯农村宁静、美丽的自然风光。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震颤着诗人最敏感的神经，诗人心房的颤动，也与溪底小石的颤动共脉搏；他要以这样神圣的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30页。

②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103页。

③ 见鲍尔高斯基《屠格涅夫传》。

感情去洗尽一切尘世的烦恼和世俗的追求。在《女神》等诗中，对祖国大自然的赞叹又化为对青春活力的崇拜和向往。而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非凡的、别具一格的倾诉，则在《俄罗斯语言》：“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要是没有你——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痛欲绝呢？”字字情，声声泪，炽热真挚的感情，不是直接献给祖国，而是献给祖国的语言！如果我们了解到诗人虽然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但他却从来没有——甚至不可想象自己会用任何一种其他语言写过哪怕一篇短文这一事实，我们就会信服只有他有最高的权利来倾吐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激情的话语。屠格涅夫一方面以他独特的抒情性的爱国热情，将他眼中祖国的自然景色和生活画面改造得更富有诗意，以呈献给人民；与此同时，在《对话》、《大自然》等不少散文诗中，大自然的美景，又往往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力出现，作为一种彼岸的永恒的观念的东西加以再现。在黑格尔的保守悲观的哲学的影响下，屠氏意图告诉人们，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微不足道的，无能为力的；善恶、理性、正义，对大自然来说都不是法规；在巍峨的群山下，人类渺小得象瓢虫！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对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思想的玷污。

将屠氏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向高峰、并标志着他的爱国主义和十九世纪其他俄国作家（如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的区别是：对祖国正直高尚的儿女的倾心关注。象《门槛》、《纪念尤·伏列夫斯卡娅》这样的佳作，无疑是他散文诗的精英。前者再现了一位圣洁高尚，准备献出自身一切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后者歌颂了作家生前一位女友崇高的道德情操和牺牲精神。没有人知道她心灵最深处蕴藏着什么珍宝，也没有人对她的遗体说过一句感谢的话，但屠格涅夫却将他的散文诗作为一束芳香四溢的鲜花，奉献给这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女性。这些散文

诗，反映了屠氏奋斗终生求索到的生活信念和美学理想。

鲁迅的爱国主义显然受到过屠格涅夫精神的启迪和感召，但又表现了不同的特色。前期的鲁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早在留日期间，青年鲁迅就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探索祖国的前途和出路。包括他最初怀抱科学救国的宏愿开始这一伟大的探索，以及后来重新选择了以文艺去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都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情。但是，他前期的创作，又并没有直接讴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野草》作为散文诗集，更不可能直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①的雄声。《野草》中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对黑暗势力的暴露、鞭挞，以及从维护本民族的尊严、为人民群众争得做健全的人的尊严出发的民族的自我批判。也就是说，鲁迅的爱国主义在此主要化为忧国忧民的思想，而且比屠氏的忧国忧民更富于思想家的睿智、哲学家的深沉、革命家的愤激。即以对祖国、故乡的大自然景色的描绘来说，不管鲁迅如何自谦他不善于写景，但《野草》中却不乏优美精粹、明丽清新的写景篇章和段落，比起屠氏来，不仅在技巧上毫不逊色，而且透过写景对生活作出的严峻直白的评价，其观察的明敏和寄寓的深刻，又非屠氏所能比。在《秋夜》、《雪》、《好的故事》、《风筝》等篇中，鲁迅将人所共见的、极普通的自然景物，以生趣盎然、美不胜收的图景收入自己的艺术画廊中，表现了健康明朗的生活情趣，给人以很高的美学享受。同时，又在哲学和诗的结合中，融入作家的心灵世界，使景色的客观意义，大大超出了它们本身。《雪》中蓬勃奋飞的朔方的雪，可以引出一个受伤的、孤独的、然而却是冰冷坚硬、深沉厚重的战士形象。《好的故事》中现实的和幻觉的，水中的和天上的自然景物融化交织，是为了启示“好的故事”不可再得，现实

① 《鲁迅全集》第7卷218页。

是肃杀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但从不把大自然的怀抱当作逃避世俗烦恼的处所，而且从不表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景色描写在《野草》中往往是一种手段。通过景色自身美与丑的尖锐冲突——如饱经风霜、傲然挺立、无私无畏的枣树，与阴险、狡猾、冷酷的凛秋寒空的冲突，通过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如好的故事与昏沉的夜的对比，去赞颂光明对黑暗的激烈搏斗。可以说，虽然屠氏与鲁迅都以抒情性的热情去改造自己笔下的自然景色，但鲁迅赋予他的景物形象的思想内涵，就不只限于爱祖国和爱生活了。

三

从屠格涅夫的出身，所受教育，信仰以及性格等方面考察，他都属于一个温和的渐进的自由主义者。但正如俄国的革命青年在他的葬礼上散发的传单中所写下的：“他以他作品的真正意义为俄国革命服务”。他正象自己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人物拉夫列茨基一样，深深认识到自己的阶级是没有前途的。作家想有所作为而不能，幻想的破灭和个人生活遭遇的坎坷，都是他那个阶级面临瓦解的反映。他同情自由主义贵族，但又不可能不表现生活真理。一直到他写作散文诗的最后年代，尽管他仍然向往温和的君主与贵族的立宪政治，尽管他还保持着写作《贵族之家》时代那种对贵族社会的覆灭深为不安的感情，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终于使他在一系列散文诗中，对贵族社会丑恶虚伪的世态人情，进行了与他那温和懦弱的性格颇不相称的辛辣的揭露和嘲讽。这些篇章，是《爱之路》中最具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意义的部分。

在《得意的人》、《处世法则》、《小丑》、《两首四行诗》、《利己主义者》、《爬虫》、《作家与评论家》等篇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俄国籍的“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

《得意的人》中的谎言编造者，他们最大的满足就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自己编造和散布的谎言。在这里，我们似乎同时找到了屠氏和鲁迅这些伟大的艺术家相近的感受。他们一生都受尽了所谓“公论”和“谎言”的伤害，有着类似的愤激。《处世法规》揭露了阴险小人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那个“狡猾的老家伙”的处世法则是将自己的一切缺点和劣行喷到别人的身上，而且做“戏”做得非常逼真。这篇散文诗透露出屠氏对沙皇专制制度愤怒的抨击，他们把欧洲文明视为洪水猛兽，实则自己既野蛮落后，又奴性十足。《小丑》同时鞭挞了那些毒辣的跳梁小丑，以及奉小丑为“天才”的胆小的庸众。在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我们看到了十分相似的立意和构思。而在《两首四行诗》中不但有着“聪明人”和他们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可从鲁迅《立论》中所披露的“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的现实中，找到绝妙的印证。《利己主义者》以高度凝练的笔法，勾勒出一个刚愎自负、一钱不值的道德恶棍，在上帝和良心法庭面前，他都会坚决宣誓自己是个问心无愧的君子。连同《爬虫》中的下流作家，《作家与评论家》中的评论家，在鲁迅的《狗的驳诘》中，都成了不耻于畜类的挞伐对象。在《爱之路》中，还有一组将批判锋芒直指贵族地主上层代表人物的散文诗。如《我的树》揭露的是地主阶级的贪婪、狂妄和无知。《颅骨们》中的贵族绅士淑女们，茶余酒后翻动着红色的舌头啧啧喳喳地高谈阔论，屠氏无情地揭去了他们那层薄薄的脸皮，露出的不过都是一个个颅骨！《菜汤》中的贵族，自以为最懂得人间的亲子之爱，但在劳苦农妇面前，她的“感情”又值什么呢？《绞死他！》中的总指挥官的骄纵专横，在作家的笔下被揭露得那么巧妙。屠氏的这一批散文诗，的确是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到高峰的明证，其中的批判鞭挞，又反映了屠格涅夫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创作个性。

在以上我们提到的两位大师这一类型的散文诗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他们是有痛切的积愤的。屠格涅夫一生遭遇坎坷，受尽势利小人的攻击谩骂——对他几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毁誉不一；对他私生活的不幸又幸灾乐祸、造谣污蔑；直到垂暮之年还遭到无耻文人马尔格维尔的刻意诽谤……。鲁迅写作《野草》的那几年，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反动军阀官僚及其御用文人的残酷迫害，各种流言、“闲话”的恶毒诬陷，还有许多来自身边的忘恩负义者的“倒戈”，以谬托知己、舔皮论骨的方式出现的诽谤……使鲁迅如生活于“六面碰壁”的险恶环境中。但比较之下、《野草》中的散文诗更摆脱了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直接针对性，升华到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整体批判的高度，去揭露种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因此，立意更深刻新颖，讽刺感和幽默感也更辛辣强烈。如《死后》中对死人还要大发议论的苍蝇，《失掉的好地狱》中比“魔鬼”还阴险凶残的“人类”，都是例证。鲁迅对《儒林外史》评价甚高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它的批判不是“私怀怨毒，乃逞恶言”。①这样的批判，更衬托出了鲁迅那决不与怨敌妥协的硬骨头精神，而不是停留在对平庸可憎的世态人情的诅咒上。这也应该说是前期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高于屠格涅夫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证明。

四

在两位大师的散文诗集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种颇相近似的强烈的愤激情绪——孤独的改革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愤激情绪，这和他们各自对改革者及人民群众的看法紧相联系。

这也是屠格涅夫的小说所热衷探索的主题。《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可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的形象。他不但否定贵族政治，批评自由主义，憎恨封建主义，而且对人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民群众的落后也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他意图唤醒群众，教育群众，把他们从奴隶处境中解救出来，但奴隶并不理解他，终于在抑郁苦闷中寂寞地死去。七十年代的《处女地》通过民粹派开展的“到民间去”运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反映这一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完全不了解俄国实际和真正的俄国农民，但作家却肯定了他们的牺牲精神。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涅兹达诺夫，正如列宁所说的“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的村庄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数十人数百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故事。”^①他满腔热忱地帮助农民认识自己被奴役的地位，但农民却奚落和嘲弄了他，最后在极度悲愤中自杀身亡。直到写作散文诗时，屠氏还在继续发挥这一主题思想，认为俄罗斯的希望不在广大人民，只有知识分子中具有欧洲文化教养的少数优秀分子才是改造的基本力量。杰出的散文诗《作粗活的人和不爱作粗活的人》，以令人窒息的愤懑，描述了一个革命者为人民群众奋斗终生，坐牢和被绞杀而毫无怨尤，但却不为群众所理解。群众不但对他毫无感念之情，根本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兄弟”，反而想得到一段绞杀他时所使用的绳子，因为据说它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你得听愚人的裁判……”》对不觉悟的庸众也进行了痛心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做着有益于世人的工作的人，而后者却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埋头苦干。

时隔半个世纪，这个震动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的巨大问题，又在灾难深重的新旧交替的中国出现，并以惊人的力量，叩击着象鲁迅这样的有良知良能的志士的心扉。《野草》中一批表现孤独的改革者的激情的篇章，成为散文诗中最富悲剧的感人力量，又最能反映鲁迅前期个性主义的特点的作品。我们知道五四时期的鲁迅，曾在个性主义等等思想的影响下，夸大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卷202页。